

6 | 文摘



甲午殇思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王晓彬分析甲午战争清军失败原因：

只买武器 不改制度

甲午战争爆发前，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晚清政府启动了以自强为宗旨、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改革。这次不彻底的改革没有挽救晚清沉沦的命运，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标志而宣告失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军事改革教训惨痛，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晚清军事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开启了军事改革的大幕，意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御侮”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这场军事改革在开阔军事视野、推行军事教育、培育军事人才、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借鉴西方军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历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杀。

军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购买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洋务派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经过积极引进和仿制，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军火器的技术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中国的舰船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接近西方水准。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主体武装力量已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火器化。以1888年北洋水师的正式成立为主要标志，晚清军事改革在海军建设方面达到了顶峰。

晚清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育多兵种军事人才，并聘请了英法专家担任军事智囊。在开明督抚大臣的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逐步建立起来。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90余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均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其中部分还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同时，清政府还设立了崭新的近代海军军种制度，并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兼采英德等国海军制度优良，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确立的里程碑，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晚清军事制度改革最高成就。

“只变事不变法”流于表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军事传统和保守战略思维的大国里，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洋务派能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经不起真枪实弹的实战检

验。
晚清军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军事改革没有触及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军事技术，在战争制胜根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模糊认识。军事改革仅仅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的低层次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晚清改革者“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也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

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军事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多少建树。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缺乏对战略层面军事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晚清军事制度十分混乱，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装备新式枪炮的军队仍旧维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依照旧军制，用陈旧的陆战思维方式指挥和管理新式海军，导致清军的整体战斗力走下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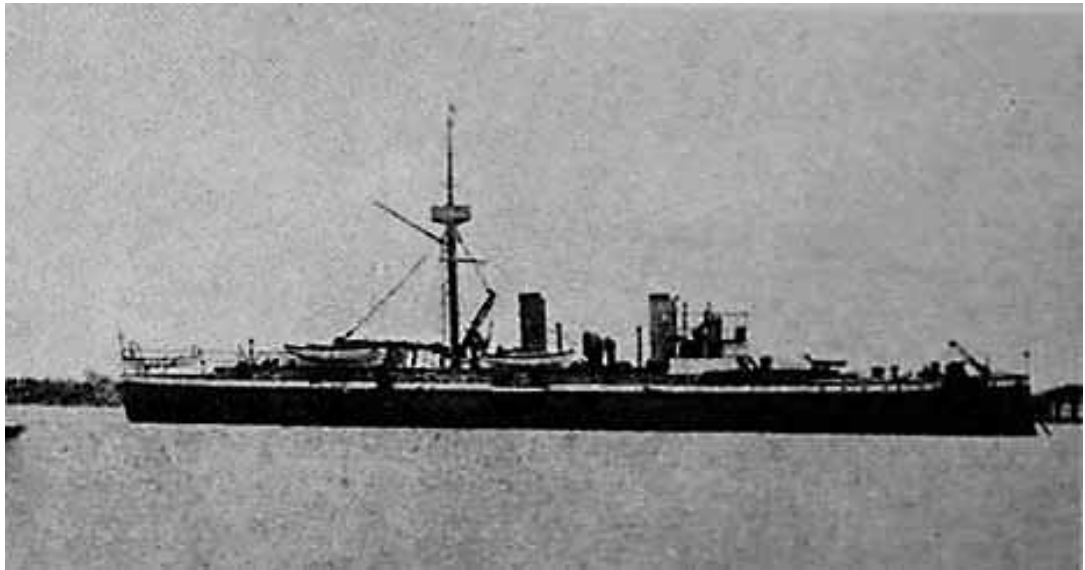
军事改革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始终没有建立独立可控的国防工业。晚清改革30余年，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始终未能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直到甲午战争前，清军还不能装备国产的系列枪炮，导致引进的枪炮、弹药型号繁杂，维修和使用极其不便，严重制约了清军战斗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耗费巨资修建的9家舰船修造厂，相互之间不能配套，导致了北洋海军维修保养能力低下，无法对当时受损的舰艇进行及时修复。火炮弹药等基本物资保障严重短缺，舰载火炮种类、型号没有统一标准，杂乱无比。

晚清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突破军事制度这个瓶颈。在旧体制的边缘实施改良、修补只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成效，但难以应对真正的战争。

日军改革彻底剑指清廷

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却落后于日本不止一个时代。日本的军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维新时期，虽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坚决，取得显著成效，变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当时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战斗力直接体现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的军事改革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日本高举“脱亚入欧”大旗，倡导“文明开化”，强调知识的力量并不亚于武器的威力。日本效仿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权一系”的天皇集权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形成



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

资料图片

了东西复合的军国主义。

日本大力引进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工业，打造近代化兵工厂。日本海军装备发展完全以清朝海军为参照系，着重提升舰队航速和火炮射速。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总体实力实际上已超越吨位相当的北洋舰队。

日军全面模仿西方军队，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海军则师从英军。日本陆军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念，从思想观念、作战理论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完全吸取了西方进攻性、掠夺性、殖民性的军事理论精髓。

日本还大力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1872年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分立。1883年把军队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实现了中央对军权的统一。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

清军改革失败被动挨打

晚清军事改革没有进行周密筹划，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过程不连贯，结局很凄惨。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对当时安全环境的准确评估、对安全威胁的应有警觉和对作战对手的清晰判断。清朝君臣们对“天朝”之外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充耳不闻，对世界性的军事变革趋势视而不见，军事改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宏观视野和内在动力。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的对手指向，单纯把军备建设作为消极防御的

手段，危机意识严重不足，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略决战茫然无知。
晚清统治阶层思想观念保守落后。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等指导思想，企图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器”进行嫁接，通过修补改良的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导致了军事改革的畸形发展。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成为晚清军事改革的严重阻碍，直接导致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积重难返。

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指导和通盘规划。洋务运动一度搞得有声有色，但由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在政治上层和国家战略层面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枢，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统一规划和全盘设计。清朝的海军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海军开建的10余年间沿海各省各自为政，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直到1885年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北洋水师更被视为李鸿章的个人武装和政治资本，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和发展。

晚清的军事改革没有充足的资源保障。清政府初起虽有改革意愿，但陋习和战略短视导致对军事改革投入逐渐减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持久动力，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大兴土木最具典型性。军事改革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军事改革没有建立新式战略理论和学术体系，治标不治本。洋务派虽然也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作战理论和学术思想，但从根本上仍囿于中国古典兵学形成的虚幻谋略优势之中，对于近代海权思想、海战理论等缺乏系统研究和了解。

战略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军事改革的进程和结局。内敛自持的陆地文明与扩张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产生激烈碰撞与冲击，其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困难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战略指

导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军事改革的进程和结局。内敛自持的陆地文明与扩张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产生激烈碰撞与冲击，其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困难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战略指

导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军事改革的进程和结局。内敛自持的陆地文明与扩张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产生激烈碰撞与冲击，其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困难重重。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战略指

导上奉行处处设防、各自为守的消极防御思想，对军事改革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加剧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抓住机遇深化军事改革

从历史脉络来说，我们今天仍处于“富国强兵”历史坐标的延长线上。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仍是我们今天军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必须牢牢抓住军事改革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主要大国普遍进入军事战略全面调整期、军事变革持续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发展期，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的博弈日趋激烈。在周边环境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克服“和平麻痹症”和消极守成思想，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必须着眼战争形态的加速演变。甲午战争给军事改革设立了一个警示性路标：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军事缺陷和战略软肋，最能验证一次军事改革的成败方向。未来战争形态正沿着信息化方向加速演进，军事改革必须聚焦战争演变规律，剑指未来战争，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作为核心指向。

必须准确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和战争制胜机理。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筹划，加速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和渗透于军事改革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存在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体系软硬件的配套改革与完善。军事改革必须实施学术理论创新、核心技术研发、组织运行模式和法规制度建设等综合配套工程，力争实现军事力量体系要素的有机结合。

(摘自《参考消息》)

新中国成立初期

彭德怀曾半年处理高官220人

阅读提示：经过了解彭德才才知道，中央警卫局正在给中央领导同志挑选舞伴，且标准很高，要求各军区选送来的女同志必须“面貌清秀、体态端正”，有些选送的女同志甚至连续两次被退回，引起军区有关领导同志的不满。

军队和其他组织一样，也会受到腐败的侵蚀。反腐败的斗争贯穿我军建军以来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由农村转入城市，中高级干部数量增多，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制止军队生活腐化堕落。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总政治部直接受理的师以上党员干部违法乱纪案件中，有30%属于生活腐化问题。

据罗荣桓的老部下冯征在《中国老区建设》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回忆，1953年7月，彭德怀带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签订停战协议期间，几个群众向他反映，有些军级干部存在居功自傲、追求享受的腐化苗头。彭德怀当即严厉批评了这几名干部。不料，其中一位资历较长的军长反驳说，中南海还选跳舞伴呢，我们跳跳舞占点几项文化娱乐活动有什么不可以？

彭德怀听后很吃惊。经过了解才知道，中央警卫局正在给中央领导同志挑选舞伴，且标准很高，要求各军区选送来的女同志必须“面貌清秀、体态端正”，有些选送的女同志甚至连续两次被退回，引起军区有关领导同志的不满。

回国当天，彭德怀派秘书到总政机要室查询了总政治部为中央警

卫局选调女文工团员的电报。当晚，他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并不知情。

后来经查实，“选调舞伴事件”是中央警卫局提出的，理由是给中央领导同志举办舞会和开展警卫部队文化活动的名义进行。毛主席指示撤销刚成立的中南海文工团，责成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处理此事。罗荣桓责成签发电报的总政副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作书面检讨，对擅自给选女文工团员附加外貌条件的秘书作出撤职处分。

这件事过后，总政派出工作组深入部队内部，调查居功自傲、追求享乐腐化的行为。半年内，查出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兵团级干部3人，军级干部12人，师级干部205人。调查处理的结果得到毛主席的肯定。1954年8月8日，毛主席将调查报告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印发全军，这就是《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指示》，又称“八八指示”。“八八指示”发出后，全军对高级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截止到1955年10月，发现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97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37人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

(摘自《环球人物》)

科学新知

彩虹为什么是弯的？

当太阳的一道光束碰到了水滴，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光可能直接穿透过去，或者更有趣的是，它可能碰到水滴的前缘，在进入时水滴内部产生弯曲，接着从水滴后端反射回来，再从水滴前端离开，往我们这里折射出来。这就是形成彩虹的光。

光穿越水滴时弯曲的程度，视光的波长而定，红色光的弯曲度最大，橙色光与黄色光次之，依此类推，弯曲最少的是紫色光，每种颜色各有特定的弯曲角度，阳光中的红色光，折射的角度是42°，蓝色光的折射角度只有40°，所以每种颜色在天空中出现的位置都不同。若你用一条假想线，连接你的后脑勺和太阳，那么与这条线呈42°夹角的地球

方，就是红色所在的位置，这些不同的位置勾勒出一个个弧。既然蓝色与假想线只呈40°夹角，所以彩虹上的蓝光总是红色的下面，以相同视角向眼睛的所有光束，必然在一个圆锥面上。

彩虹之所以为弧型当然与其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样这也与地球的形状有很大关系，由于地球表面为一曲面而且还被厚厚的大气层所覆盖，在雨后空气中水含量比平时高，当阳光照射入空气中的小水滴形成了折射，同时由于地球表面的大气层为一弧面而导致了阳光在表面折射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弧形彩虹。

(摘自《苏州日报》)

掌故

古代灯具由食器转化而来



牛形缸灯

礼乐长监治”十字铭文，说明此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制造的灯。此灯最大的特点是只有三只，后腿有凹槽，好似蟾蜍一般。其尾巴紧贴腹部，两眼圆睁，还有伸出的牛角，又似牛的特征。憨态可掬，安详雍雅，兼具了写实和抽象两种艺术风格。

汉代铜灯盛行动物造型的设计风格，另外一件在此时期出土的铜羊灯雕作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视，憨态可掬。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体中空用以储存油脂。因中国古代“羊”与“祥”通用，以羊形作灯象征吉祥之意。

灯具是人类掌握用火以后的一项重要发明。中国使用灯具的历史十分悠久，油灯作为传统的生活用具，经历了几千年演变的历史。最初，灯是从食器中的豆转化而来的（豆本是商周时的一种饪食器，而陶豆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灯具）。直到汉代，灯的基本形制仍与豆差别不大，成为最常见的灯型。除豆形灯之外，在汉代还有一些像这款牛形缸灯一样的动物造型灯，在宫廷王府中广泛使用。灯盘分层错落安置，造型生动，点燃之后，灯火交相辉映，尽显气派。

(摘自《文史博览》)

“红头文件”始于南北朝

“红头文件”并非法律用语，是老百姓对各级政府机关（多指中央一级）下发的带有大红字标题和红色印章文件的俗称。

据考证，“红头文件”始于南北朝的西魏时期，当时有位出色的政治家苏绰，他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地理，尤其擅长算术。据《周书·苏绰

传》记载：“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朱出墨入”，指的是朝廷发出的文书是用朱（黑色）标，下面上呈的文书是用墨（黑色）标，对比显明。由此可见，我国今天通行的公文程式是由他制定的，而“红头文件”已经有1400余年的历史了。（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认真：德国人深入骨髓的习惯

1944年冬，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铁壁合围，法西斯第三帝国覆灭在即。整个德国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氛围里，经济崩溃、物资奇缺，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严重困境。

对普通平民来说，食品短缺就已经是人命关天的事。更糟糕的是，由于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冬季非常寒冷，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燃料的话，根本无法挨过漫长的冬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只得允许老百姓上山砍树。

你能想象帝国崩溃前夕的德国人是如何砍树的吗？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人们非但没有去哄抢，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地搜索，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再告诫民众：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将要受到处罚。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规定简直就是个笑

话：国家都快灭亡了，谁来执行处罚？

当时的德国，由于希特勒的垂死挣扎，几乎将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都抽调到前线去了，看不到警察，更见不到法官，整个国家简直就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全德国竟然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每一个德国人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的规定。

这是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在回忆录《留德十年》里讲的一个故事。当时他在德国留学，目睹了这一幕，所以时隔50多年，他仍对此事感叹不已，说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条件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德国人在如此极端糟糕的情况下，

仍能表现出超出一般人想象的自律？答案只有两个字：认真。因为认真是一种习惯，它深入到一个人的骨髓中，融化到一个人的血液里。因了这两个字，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初中叶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又奇迹般地迅速崛起。

再讲一个关于德国人认真的小故事。熟悉柴油机制造业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说法：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音在数公里外都听得见，柴油机周围数十平方米都是油迹；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则可以放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工作，根本不会影响隔壁房间的人办公。

于是，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企业家格里希任厂长。

格里希上任后开的第一个会议，武汉市有关部门领导也列席

参加了。没有任何客套，格里希便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如果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那么，清洁度就是气缸的质量及寿命的关键。”说着，他当着有关领导的面，从摆放在会议桌上的气缸里抓出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个气缸是我在开会前到生产车间接机抽检的样品。请大家看看，我都从它里面抓出来了些什么？在我们德国，气缸杂质不能高于50毫克，而我所了解的数据是，贵厂生产的气缸平均杂质竟然在5000毫克左右。试想，能够随手抓得出一把铁砂的气缸，怎么可能杂质不超标？我认为这不是工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责任心问题，是工作极不认真的结果。”一番话，把坐在会议室里的有关管理人员说得坐立不安，尴尬至极。

两年后，格里希因种种原因卸职时，已经下放到平均1000毫克左右。回国后，格里希又几次来中国，每次都要到武汉柴油机厂探望。有次在厂里，他拿着磁头检查棒发现气缸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时，忘了自己已经不是厂长，仍然生气地向周围陪同的人大声咆哮：“你们怎么能这么不认真！”

如果说强大的德意志是一个可怕的民族，那么，认真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大能使一个国家强盛，小能使一个人无往而不胜。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德国人认真得近乎刻板的精神，并认真贯彻落实到自己的血液，你也会焕发出一种令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感到害怕的力量。

(摘自《中国日报》)